

读者参考

丛书

99

我们为什么渴望浪漫

◎六问中国核安全

◎2010年中国财富流向分析 ◎中国“80后”越来越现实

◎影响2011年股市的几个关键因素

◎可以不成功，但不能不成长 ◎中国电影的伪黄金时代

DU
ZHE
CAN
KAO
CONG
SHU



NLIC 2970703105



学林出版社

读者参考

丛书

99



NLIC 29707031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为什么渴望浪漫 / 《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1.6

(读者参考丛书 / 林雨主编; 99)

ISBN 978-7-5486-0162-3

I. ①我…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中国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4145 号

本书资料除编者据各种资料汇编而成的文字以外,所用图文资料均标明出处及作者。转录图文均酌付稿酬。有未及奉达者,请即与我编辑部联系。

我们为什么渴望浪漫

读者参考丛书(99)

2011年6月出版

编辑:《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雨

责任编辑:天水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81号

邮政编码:200235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电话:021-64084572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81号

邮政编码:200235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8

字数:28万

ISBN 978-7-5486-0162-3/Z·11

定价:13.00元

读者参考丛书
(99)

我们为什么渴望浪
漫
目录

中国未来十年的七大挑战	1
顶层设计关键在于能否过“全面利益 调整关”	6
核辐射与高货币将引发地震后又一场 灾难	10
六问中国核安全 ——专访中国核能动力学会经济专业委员会 原主任温鸿钧	12
《原子能法》一拖 27 年	15
民众淡定,“最好的国家宣传片”	17
消灭和肢解利比亚是西方既定战略	20
突尼斯之变: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意外 成果	23
土耳其在中东乱局中影响力上升	25
俄日岛屿争端暴露俄东进意图	28
“迷雾四国”或成投资新热点	109
2010 年中国财富流向分析	32
扩大内需必先满足内需	35
《经济学人》眼中的中国 GDP 地图	37
公共预算离我们有多远	30
7.7 万亿税收如何用之于民	39
一种坏的税	41
中国楼市泡沫值得警醒	43
让保障房成为社会稳定器 ——法新美英四国经验谈	45
中国开发商对建保障房或“不感兴趣”	49
美建筑师分食中国房地产蛋糕	51
影响 2011 年股市的几个关键因素	55
压垮股市的 IPO 稻草	59

警惕限购激起股市泡沫	61
支持李荣融炒股	29
保质	62
我们为什么渴望浪漫	66
闲话幸福婚姻	68
女人希望男人明白的事	71
我与中国梦	79
2011“两会”十大言者	74
一个癌症患者的生命日记	84
落马高官邱晓华复出之路	88
一个股长如何敛财近亿	90
纳赛尔——阿拉伯世界首位 “正确独裁者”	92
怀旧	94
朴素者	119
钱是青春所无法驾驭的	96
熟人的成本	98
先给别人找理由	50
够好就好	101
你看到的只是第一排水果	104
抓住小细节感受大幸福	112
阿里巴巴“诚信门”	106
人的城市化	113
什么打碎了我们的“城市梦”	110
中国“八零后”越来越现实	117
从药家鑫杀人案看“底线教育”—— 可以不崇高,但不能无耻	116
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应当学会消费	249
大学的责任	122
可以不成功,但不能不成长	127

中国爸爸在教育子女上陷入尴尬	130
“怎么大学生不如农民工” ——一个大四学生“无颜面对的事”	133
俞敏洪:该如何做个好家长	118
南科大改革:能走多远走多远	131
外企职业经理人回归潮	136
七成职场人看重“灰色技能”	27
探访老派绅士傅聪:钢琴家不只是光彩 的手指	139
陈志远:低调的音乐裁缝	58
中国电影的“伪黄金时代”	145
陈宝国:我给自己打90分	148
《中国远征军》:讲述真实的滇缅抗战	146
一个村子的记忆,一个国家的记忆 ——访著名作家贾平凹	153
蒋方舟问韩寒	99
李大眼与“抗拆迁百科全书”	156
陈丹燕:成熟在旅行中获得	165
《你在高原》:文学的信仰	167
“鲁迅可能从未被真的理解” ——陈丹青近日上图浙大两场演讲谈鲁迅	169
“大江大海”的两个版本	171
历史中的“我们” ——当代中国的民间写史者	160
读书心得	105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174
党史人物研究最新进展	179

网络时代怎样做公仆	184
“大趋同”正改变世界	188
女人是文明的一面镜子	197
最具危害的十大发明	102
电子垃圾:全球化的阴暗面	199
不可思议的科学真相	231
新中国军费开支的历史演变	200
楼兰三大未解之谜	142
青岛海湾大桥争议	202
中国岛屿正在加速消失	203
高尔夫球场围京城	173
香港人的容易和不容易	192
传台湾即将放宽大陆投资	205
澳门还富于民的启示	72
外媒称中国成“世界高科技工厂”	206
美国人怎么看中国	207
从美国学者谈中国民主说起	209
到中国开会	214
如果中国人与犹太人做生意.....	216
西方的罢工告诉我们什么	168
外国公务员的“紧箍咒”	223
详解全球稀土发展格局	210
“伊斯兰能源”时代可能终结	190
世界劲刮蒙古风	228
欧洲教堂为什么盖这么久	114
“小大国”匈牙利	235
新加坡为什么不打压房价	237
国外过节官员不敢慰问穷人	135

改革需要大思想大智慧	154
改革顶层设计 重构利益格局	240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居世界首位引争议 ...	187
官员要习惯掌声越来越少	97
政府要做的就是少从家庭部门收钱	19
要让“世界第二”与百姓有关	14
省部级高官如何“退居二线”	137
尴尬的中国信用评级	241
国企2万亿利润的隐忧	242
贫困线标准该提高了	9
“暂行条例”还要“暂行”多久	54
“舆论监督是正面报道”应成共识	129

谁在管理 13 亿人的营养	238
中老年人要养髓	243
一次 CT 等于 750 次 X 线胸片	222
健康食品的两面性	245
适当超重更健康	44
这些传统养生说法对不对	177
免疫力不是越高越好	246
吃太多豆腐会引起动脉硬化	248
调味品的保健功能	120
喝咖啡可预防女性中风	70

今日说法	5、11、22、31、34、38、40、48、67、 78、83、87、89、93、95、126、132、 155、164、170、204、208、213、 221、227、234、236、239、244
------------	---

封面图片 净土
 图片提供 林 路

中国未来十年的七大挑战

□邓聿文

2010年上半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从未有过的国力最为强盛的时候;但愈是在这样的时刻,愈要谦虚谨慎、战战兢兢,因为不仅国民在此种表面的强盛中不知不觉变得自大起来,而且,事实上,无论从内外环境来看,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将面临比以前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三十余年改革和发展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到了一个总爆发的临界点上。就国内来说,如果未来十年,不妥善处理 and 解决好以下几大问题,后果堪忧。

挑战之一： 实现经济再平衡

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系列失衡为代价的,如过度依赖出口与外部需求拉动制造业发展,内需与外部需求比例严重失衡;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投资增长,私人投资相对疲软;过度依赖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发展失衡等等。这一系列失衡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国民所得不多,致使内需多年都启动不了。

实际上,从“六五计划”开始,中国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和任务,然而,如今“十一五”已过,发展方式依然如故。假如在未来的十年内,中国在发展方式的

转变上没有取得进展,或进展不大,那么,不排除或者注定会像此次金融危机,以同样的破坏力度甚至更大的破坏性来强制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如此,无疑是中国经济的悲剧。

挑战之二： 缩小贫富差距

贫富分化是经济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阶层对抗的大问题。

贫富分化首先表现为收入问题,除此外,它还包括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公共服务的分享以及机会的均等与否所造成的贫和富的两极分化。中国的收入差距不仅仅体

现在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的悬殊上,而是表现为全方位的,包括城乡、地区间、行业间的收入差距等。国家发改委一个研究机构的调查研究表明,截至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4.8,如果算上隐性的各种补贴,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5,这是衡量收入差距的极限。

先富已实现,但“共富”的实现还显得遥遥无期。根本原因就是先富起来的阶层中有相当部分的人是靠不正当的方式和手段获取财富。这虽然有历史的具体的因素,可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正因如此,也就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和差距过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实行如果不伴随对资本和权力的节制,将会放大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即自动导致两极分化。这是中国收入差距悬殊的两个制度根源。

未来十年,必须把解决贫富差距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否则,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挑战之三： 反腐任重道远

各种调查均表明,腐败是社会公众最关注同时最不能容忍的问题之一。

中国历代王朝差不多都毁于腐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腐败的失控将破坏关键的治理制度,引起公众的不满,加剧社会经济的的不平等,并加大爆发全面危机的

风险。据估算,每年因腐败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占GDP的3%,这部分财富被转移到了小部分人手中,加剧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腐败的间接成本,如效益的损失、浪费,以及对环境、公共卫生、教育、关键性公共机构的信誉与文职机关士气的损害,更难以估量。此外,腐败还会弱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执政基础,大幅降低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治理能力,并为民族分离势力制造分裂提供了一个有蛊惑力的借口。要命的是腐败会带来人心的丧失。

因此,未来十年,如果在反腐上成效不大,那么,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都有可能借着腐败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对此风险,不能掉以轻心。

挑战之四： 重建社会价值观

与腐败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社会道德的退化和社会价值观的紊乱。一个社会,固然需要制度来维系其正常运转,但决定人们日常行为和社会活动的最本质、最深层因素,还是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和文化价值。一个人若无羞耻之心,无所敬畏,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这些年来,我们生产了多少假冒伪劣、有毒有害产品,发生了多少安全生产事故?学界不像学界、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品格,几乎每个行业、每个职业都缺乏良好的道德

操守和职业规范,乃至是非不分、一切向钱看,为了利润,敢于将一切社会道德和价值踩在脚下。

很多人把我们社会的道德退化和溃败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实行。其实,这大错特错。市场经济的第一要义是自由选择,公平竞争。市场经济也排除等级、身份、特权等不平等因素,它要求机会均等,公平交易。有信用才能产生持续的交易活动。所以,市场经济的道德内涵就是自由、诚信、平等、公平、正义等这些美好的品质,它们也是市场经济根本的价值观。

但为什么市场经济被引入中国后产生了变异?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不是说中国目前没有价值,官方一直在倡导符合其要求的所谓主流价值观。然而,现实中这套价值体系实际上败于功利主义之手。功利之心原本人人都有,有功利上升为主义,无疑与政府的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一个政府主导社会资源的社会里,如果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那么必然会导致政府短期行为的频繁发生,致使政府行为捉摸不透,不可预期,这反过来又直接造成社会信任的进一步下降。处于这个社会的人们,自然只问结果,不问手段,以结果来评价人和事,这就是功利主义的最大特点。

此外,产权制度的缺失,社会分配的失误,也会导致社会价值的“错位”和道德水平的下降。无恒

产者无恒心,自然就不会有诚信。社会分配出了问题,劳动者得不到与其劳动价值相对等的份额,会刺激人的不劳而获思想。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有一个健康的价值观,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而健康的价值观,一般是由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充当的。倘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出了问题,不被这个社会的多数民众尊奉,道德出现溃败也就无须奇怪。道德一旦溃败,信用全面退化,不仅会导致不必要的过高的交易成本,阻挠市场体系的建立;而且时间一长,会毒化一个民族的心灵,这是非常可怕的。当下为什么会出现各种泄愤行为,深层根源即在于此。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这种全面的道德和价值崩溃,尽管社会忧虑重重,但至今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校正。未来十年内,此种状况若得不到有效改观,会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又一风险源。

挑战之五:

遏止环境污染蔓延

如果说,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称得上是“中国的奇迹”的话,那么,这三十年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速度,也称得上是另一个“奇迹”。各种统计都表明,照目前的污染水平走下去,随着我们的经济总量再翻两番,污染负荷还可能增加四至五倍。目前,要在中国找到一块未受污染的净土,相当难。因此,完全可

以说,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严重程度,完全体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粗放性、浪费性。

对于中国的环境危机,虽然我们意识到了,而且政府也是有意识地采取措施纠偏,但要彻底改变这种靠消耗资源和环境的发展方式,还很难,这不仅因为在一些环境脆弱的地区,还存在繁重的脱贫任务;更因为地方政府头号的目标还是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而环境因素的考虑往往要求降低增长速度。

未来十年,环境问题只会进一步加剧而不是减少。而环境一旦爆发危机,由于环境具有免费索取的性质,那么,它对社会经济和我们生存的家园造成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这种灾难几个世纪都难以修复。

挑战之六: 布局人口再生产

相对于上述几方面,人口问题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常常被大众所忽略。其实,它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点也不亚于其他问题。

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根据一些专家的估算,改革以来人口红利对中国 GDP 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 26.8%。但据一些学者计算,最早在 2015 年前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开始枯竭。

更严重的还在于社会方面和人自身的再生产上,包括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衡,独生子女在其成长过程所遭遇的各种风险等。它们可能会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对此,我们不得不防。

挑战之七: 解决政府治理的危机

最后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政府治理的危机。改革三十余年来,经济的高增长及其给民众带来的物质条件的改善;社会生活自由度的相对扩大;执政党及其政府坚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理念,正是这些在支撑着政府治理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其中四个方面的问题尤其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挑战:一是独生子女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现在还难以看清;二是城市化程度大大提高;三是信息革命的发生,人们学习、相互沟通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四是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加。这四个问题同时发生,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时经历这些变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这些变革的速度像中国这么快,规模像中国这样大。中国能否成功应对这些变化和挑战,将决定中国是否能够进入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成功国家。

然而,不得不严肃指出的是,尽管中国政府面对着这些挑战,但政

府对 GDP 主义的过度追求,却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如政治体制改革被悬置,市场化改革在产权、政府职能、要素价格方面裹足不前,社会分配上贫富分化悬殊,再加之贪污腐败、道德失范、信用缺失、环境破坏等诸多问题,从而使执政党和政府单一追求的政绩合法性越来越不能说服人们,支撑执政党和政府合法性的资源在不断流失。

对执政党和政府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应该说,现在人们包括执政党和政府自身,有着基本的共识,否则也不会提出科学发展观。

政府治理危机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不会有本质的变化,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无疑是一大警讯。

化解危机唯有继续改革

事实上,前文所述七个问题只是为了分析的便利,现实中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一个问题的解决是另一个问题解决的前提,反之也一样,换言之,它们互为因果。这就需要我们从整体着眼,找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之道。根本性的解决办法现在看来只能实行民主,这是全部

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历史证明,当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利益的分化和整合导致社会基础发生改变后,唯有民主才能保持社会的有序运转。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当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和发展时,政治体制应该适时进行相应改革。否则,社会就可能陷入革命和暴力夺权,这无疑对执政党和整个社会都是不利的。因此,为长期执政计,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启动政治改革,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授权的基础上。

民主从来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政治改革和民主化都有阐述。当然,政改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政治体系的各个方面和人们的切实利益,包含着相当广泛的内容,推行起来必须有一个行动路线图,要有轻重缓急。就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人们的期待而言,政改关键是依照现代民主和法治的要求,建立起配置合理的权力架构和治理结构,而目标则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摘自凤凰网)

今日说法

我曾经在苏格兰、英格兰、挪威和土耳其踢球;但是我得承认,我对于中国的球员感到失望,他们对待足球,并不像我那么认真。如果你

去那里不是为了度假,而是想延续你的足球生涯,那就算了,因为你会感到沮丧。

——曾效力北京国安的苏格兰球员罗斯接受《太阳报》采访时公开炮轰国安。

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顶层设计关键在于能否过 “全面利益调整关”

□王 羚

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反复提到了加强“改革顶层设计”这一全新的概念。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

中国许多领域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必须通过明确、统一、科学的顶层设计来集聚人心,推动收入分配、城乡一体化等重大改革进程。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日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由于改革已经形成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再加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盘根错节,阻力重重,因此顶层设计的关键在于是否敢于在全面利益调整上动刀子。

“帕累托改进”的空间 越来越小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说目前这个时间点,中国尤其需要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迟福林:其实不光是现在需要,一直都需要。只是说现在到了

一个特殊的阶段,没有这样一个顶层设计,改革就无法顺利进行,就无法达到期望的目标。

过去三十年的第一次转型与改革,带有增量改革的鲜明特征。在增量改革中,往往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就是在其他人福利不降低的情况下增加一部分人的福利。这是“摸着石头过河”往往能够取得成功的特定背景。

如今情况不同。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帕累托改进”的空间越来越小。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更多涉及包括政府体制在内的存量的制度变革,其深刻性、复杂性远远超出第一次转型与改革。

因此,对于改革的下一个阶段,最高层必须做出总体规划和部署,确保改革有序进行。

同时,下一步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三者的协同。尤其是政治体制转型,现在还缺乏共识。三个转型的融合更需要从全局的高度加以运筹帷幄。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也就是全面利益关系调整的阶

段,涉及全面的利益关系调整和利益博弈,走哪一步都要动利益。比如政府部门,本来是公共利益代表者,现在也有自身的利益。此外,还有地方利益、行业利益也需要调整。

从“十一五”改革看,在政府转型成为改革关键和重点的时候,由部门自行设计方案来推进改革,难以保证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一些改革最初的想法很好,但改革方案难以避免部门利益的局限性,容易使改革扭曲变形。

“十二五”时期加快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改革的“重头戏”,将涉及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的事业单位改革。这些改革如果由与事业单位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上级主管部门自行设计,就很难有实质性突破。这就需要研究如何通过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出台超越部门利益的改革方案,真正按照“管办分离、政事分开”的要求推进公益机构改革。

未来五年,改革将更多地触及地方利益。比如,政府对关系重大民生问题的房价进行调控,将涉及地方土地收入作为“第二财政”的问题。再比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成为“十二五”时期改革的主攻方向,中央政府要控制过剩产能,调整经济结构,严格限制高污染行业,可能会使许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这些问题都必然涉及中央、地方财税关系调整的深层次问题,都需要在中央统筹规划,统一领

导的前提下才能有效解决。

从行业利益看,这些改革涉及铁路、航空、邮政、电信等多个行业的利益调整,涉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平等参与。在发展方式转变的特定背景下,按照民富优先的原则,使更多的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使更多的国有经济配置在公益性领域是一个大方向。只有在中央的统一部署、统一规划下,才能切实推进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国企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

重大改革需要中央 下决心来推进

日报:近几年许多重大改革进展缓慢,你认为是因为缺乏顶层设计吗?

迟福林:近几年我们在许多重大改革上有所推进,但突破确实不大。比如大部制,虽然形式上有了变化,但实质上并没有多大改进。在落实行政范围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方面,没有实质性突破,甚至还没有真正破题,距离中央提出的目标还相差很远。

这些重大改革确实需要中央下决心来推进。顶层设计包括三个部分:对改革的总体规划和部署;高层的有力的改革协调,包括检查监督;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对于一些还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顶层设计应该能够促使形成共识。

日报:有人认为收入分配改革

应该是顶层设计的核心。你认为当前应该如何进行顶层设计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迟福林：未来五年，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为撬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提供一个战略支点，为发展方式转变创造内生动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涵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体性建构。这样的改革，单靠地方层面的探索，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总体来说，目前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问题是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如何具体化。这个是需要下决心的。

关于两个同步的具体化，有两点很重要：第一是实际的同步还是虚的同步？所谓实际的同步，是要考虑物价上涨等各方面因素，是真实的同步，是老百姓能够感受得到的。

第二是两个同步不仅应该包括城镇居民，也应该包括农村居民。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就很不错了。所以在下一步的发展中，要把这个作为约束性指标来做。

这同时也包括一系列具体用于保证实施的措施，比如如何保证劳动者的报酬与生产率提高同步、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如何全面推进等。

在收入分配领域，基本的共识

还没有形成，有的说不做大蛋糕怎么分好，有的说不分好蛋糕怎么继续做大。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必须形成基本共识，这个就有赖于顶层设计。

让农民工市民化 关键在于决心

日报：现在农民工问题是社会非常关注的热点，而且牵动许多社会问题。你认为该如何通过顶层设计来解决农民工问题？

迟福林：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推进2亿多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未来五到十年不可回避的全局性重大课题。

农民工的市民化涉及现行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以城市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为例，涉及跨省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在流出地，但他们接受教育在流入地，尽管一些发达地区做了不少探索，但跨省区协调的问题不解决，改革局限在地方层面是难以有大的突破的。

我曾经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让“农民工”这一概念成为历史，也就是完成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但有人认为不可能。我认为，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将来付出的成本会更高。所以我说，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虽然也需要相应的财力，但归根结底是决心和判断的问题，不是能力问题。

贫困线标准该提高了

□洪振快

最近,全国政协委员沈雯在递交给“两会”的提案中,建议将标准调高到2400元以上,达到“1天1美元”的国际通用赤贫标准。贫困线标准调高,不一定意味着真实标准的提高,因为这涉及购买力的问题。按照北京的米价计算,1985年北京大米为0.254元/斤,206元(当年的贫困线)可买811斤大米,平均每天222斤;2009年北京的大米以2元/斤计算,1196元(当年的贫困线)可买598斤,平均每天仅为164斤。这意味着,虽然2009年贫困线标准从表面看是提高了,真实购买力还不如1985年。贫困线标

准过低,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结果:一是贫困人口被低估,二是财政投入不足。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2001年贫困发生率,按“1天1美元”衡量为166%,按“1天2美元”衡量为46.7%,而当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按农村贫困标准衡量仅为31%。财政投入方面,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从1980年到2007年的28年间,中央财政安排扶贫资金1600多亿元,平均每年仅为57亿元左右,与每年数万亿的财政支出总额相比,差距很大。

(摘自《新京报》)

另外,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要明确。这样有助于具体工作的推进。

日报:目前来说,做好改革顶层设计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迟福林:首要的就是在难以有广泛共识的前提下,改革必须要有基本共识,否则很难推动下去。

其次,改革不是小打小闹,必须是更大的决心、更大的魄力与更大的行动相结合。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看,由于改革触及分配领域,在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的制约下,没有决心和勇气,一些领域改革方案迟

迟难以出台,一些领域改革的方案制定尚未提上日程,一些局部领域的改革虽然推出了,但没有最终解决问题。比如公车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公务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等难啃的“硬骨头”能不能进入规划,能不能付诸实施,主要取决于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以及实际行动的落实。

其三要看看能不能过利益调整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回避。顶层设计的关键是敢不敢在利益关系调整上动刀子。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